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17 \*  
27 February 1975

CHINESE

第一八一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黄华先生	(中国)
<u>出席：</u>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哥斯达黎加	契尔努申科先生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森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意大利		普拉雅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布布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  
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  
三月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 Incorporating S/PV.1817/Corr.1

下午三点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同席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11625）

主席：按照第一八一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建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参加辩论，但没有表决权。

在主席邀请下，塞浦路斯代表克莱儿季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先生就安全理事会席位。

主席：按照第一八一五次和一八一六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保加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以便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在主席邀请下，保加利亚代表格罗泽夫先生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我还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罗马尼亚常驻代表的信，要求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邀请他参加我们的讨论，但没有表决权。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和惯例，我提议邀请罗马尼亚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我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我们了解我请他发言的时候，会请他来在安理会席位上就坐的。

在主席的邀请下，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在安理会议事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席位上就坐。

主席：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塞浦路斯局势问题。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自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成员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在安理会的正式会议中讲话，愿借此机会，首先表示我代表团对于一件巧合的事，如何的高兴，那就是看到主席先生主持安理会本代表团作为成员所参加的第一次正式会议。 由于你是一个老同事，又是与我国享有很亲密热烈关系的一个国家的代表—在贵国我曾经有充任我国代表而工作过的荣誉和特权——所以我代表团对于贵主席惟有提供最大的合作。 你杰出的外交成就和在联合国内个人地位对于我们全体都是对你充任主席的极大信心的来源。

我也愿向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契尔努申科大使就他在一月间领导安理会，表示我们的感谢。

我们也感激其他安理会成员向我们代表团所表示的热烈欢迎。 并特别感激苏联常驻代表马克林大使对我个人和对我们所说的好话。 我们保证在安理会上工作中尽我们最大的合作。

联合国在非殖民化的领域里的成就一次又一次地在安理会里和其他的论坛上受到赞扬，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之中在联合国创立以后获得独立的人，有许多不能不意识到这个组织对我们争取独立所作出无法估价的贡献，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希望我们作为独立国家能够决定我们自己的将来，并且能和其他国家合作，为我们经济进步而努力。 在参加联合国的时候，我们培育着一种希望和一种信心，也就是整个的本组织，特别是它的成员，会为保障和平与安全而努力，使我们的独立可以对我们的人民具有实质上的意义；因为没有和平和安全，独立便受阻碍：发展和进步如不可能，至少也受到了妨碍。

就是为了追求这种和平及安全，并且为了巩固所有各国的自由与独立，本组织才在一九七〇年发布了关于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它的第一项规定便把对任一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武力威胁或武力使用都谴责

为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塞浦路斯共和国在将近十四年前从联合王国获得独立，这个年青的共和国象我们大家一样，也希望在获得独立以后、作为联合国的一员，它可为它人民的经济命运的改善而展开它民族复兴的斗争。这个年青的共和国希望本组织和它的成员会保证它会被容许在和平和安全中如此做去。但是自从塞浦路斯独立以来它从没有享受过真的和平与安全。它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它不结盟的政策受到口惠式的尊敬多于实际上的尊重。大概在我们联合国会员中也找不出其他国家的领土象这样从获得独立以来便继续不断地受到瓜分威胁的了；大概也没有其他国家的独立是因外来势力不断干涉而受害的结果而象这样岌岌可危了。的确，从独立以来，该国统一直接间接都受到外国干涉的破坏。

我国与塞浦路斯共和国间享有悠久的友谊，并在许多地方——包括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努力——一直合作。坦桑尼亚政府与人民仍然宝贵地记得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阁下对我国所作的国家元首的访问。那次访问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二个不结盟国家间的友谊与合作的联系；所以我们一直以深切同情和失望的心情注视着塞浦路斯人民身处其中的日益恶化的局势，这也是可理解的。

我们关注地看到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未能终止这种降临在这年青的共和国和它的人民身上的厄运和痛苦，尽管这个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来已达十一年之久了。我们确信，联合国能够也应该担负起它在这个事项上的责任。我们强烈地赞同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在他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给安理会的声明中所表达的关注。的确，十一年以来，塞浦路斯人民一直把他们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本组织上，如果不能及时满足这种期待，可能会使全世界对我们本组织的希望为之彻底幻灭，以及和平与安全基础的崩溃。因为，正如已经正确地指出，塞浦路斯问题是我们本组织有效性与信用的重要考验。塞浦路斯的不论什么遭遇，足以表示任何其他小独立国也可能碰到的遭遇。

因此，坦桑尼亚认为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件对我们组织中较弱会员国家有直接而特殊关系的事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对塞浦路斯主权、

领土完整、独立和不结盟政策的威胁，不仅仅是对本组织的一大挑战，并且对本组织许多会员的和平及安全，也具有严重不祥的涵义。尤其是不结盟国家如果忽视这个威胁，只会带来我们共同的危险。

不过，虽然我们在本案中惋惜联合国无效率，我们仍然充分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所有有关各方在寻求解决的努力中提供合作的义务。从这个岛上两族间冲突十分可悲的历史来看，很明显地，如果本组织还要担任有效的角色，那么这种合作便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愿意重申我的许多同事以前在本安理会议事中所已经雄辩地说明的一点，也即：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悬于有关各方是否愿意尊重并严格执行由安理会第365（1974）号决议所赞同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该大会决议是在所有有关方面的一致同意下通过的，要求一切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并且不对它进行任何行动与干涉等等。该决议促请所有外国武装部队与外国军事设施与人员迅速撤出塞浦路斯，并促请停止对该国事务的一切外国干涉；又认为所有难民应该安全地返回到他们的家乡。

所以本代表团愿意参加强烈地呼吁立即从塞浦路斯撤出所有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设施与人员。基于人道上的考虑以及为了和平解决本问题，绝对须要允许难民返回他们的家乡不可稽延。同样重要并且同样紧急的是重开两族谈判的必要性。但是，我们也十分清楚在这方面现有的死结；我们同意，必须造成必要的气氛，以便推动重开这些谈判。

在这方面，坦桑尼亚对于重开谈判的方法，并不认为非用这种或那种的过程不可。同样重要的事是：要这些谈判有意义并有结果，必须让它们不受压力、在不造成既成事实情形下举行。不用说，单方行动——诸如土族塞人宣告成立土族塞人国家的行动——只有使局势更其复杂并使谈判更形困难。正如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在执行部分第3段所述：塞浦路斯共

和国的宪法体制关涉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两个社区；但第4段提到要一项经过自由谈判、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根据有关各方都接受了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一节，我们相信，如果有他们善意和秘书长及安全理事会的协助，是可以找到一项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行程序的。

本代表团认为，在所有各有关方面都接受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情形下，已经为谈判创立了必要的构架；就等他们来把握这个机会、为和平解决而努力了。特别是二个塞浦路斯人的社区必须下定新的决心而为他们国家的和平、互相谅解及统一作出相应的行动。

我在结束以前，愿意把对秘书长为寻求塞浦路斯和平和谅解所作出可佩的、无私努力正式表明我们崇高而诚恳的敬意。他坚持不渝的努力，在困难情势中表现出极度热心与忍耐，对本组织为本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是一项可贵的贡献；我们也对他的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为二族间谈判促成双方接触所担任的重要角色，表示敬意。

安理会所至少应该做到的是给秘书长所需要的一切鼓励与支持。同时，坦桑尼亚代表团相信，安全理事会也应该奋力保证它的决议——特别是那些经过一致通过的决议——受到执行。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象圭亚那代表团一样，愿意支持对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应该受到迅速执行一点加以时限；这样不仅仅会唤起希望，又对世界表明我们目的的严肃性，并且还会对我们为符合塞浦路斯人民合法期望而努力以达成目标而言，会意味着一项重大进步。

主席：现在，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就我们当前讨论的议题发言。

中国代表团对塞浦路斯局势表示严重的关切。我们曾多次指出，塞浦路斯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它们采取利用矛盾、互相制约的政策的后果。去年以来这个问题再次爆发，从内部来说，是由于塞浦路斯岛上民族之间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从外部来说，则是由于

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对东地中海地区的霸权，都力图把这个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岛屿置于自己的影响和控制之下。它们对塞浦路斯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对塞浦路斯两族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到哪里，就给哪里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害。塞浦路斯的事态发展，再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

一个超级大国在幕后操纵，兴风作浪。另一个超级大国早就对塞岛虎视眈眈；自去年七月以来，它在塞浦路斯的问题上的丑恶表演淋漓尽致，早已逐步被人们识破，但它并不死心。去年联大有关塞浦路斯问题决议通过后，它又竭力从幕后插手和破坏两族谈判，企图制造矛盾，扩大事态，以便从中渔利。最近，它利用两族谈判中出现的困难和新的事态发展，又一次迫不及待的发表声明，多方活动，兜售它那个陈腐的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妄图将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十分明显，它所鼓吹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为它的干涉开放绿灯。超级大国所提的种种方案，都不是为了塞浦路斯人民利益，而完全是为了它们在地中海地区扩张的需要。对此，人们应该给予足够的警惕。

我们认为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我们不愿意看到事态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给超级大国，特别是那个自封为塞浦路斯人民“朋友”的超级大国以可乘之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归根结蒂只能依靠塞浦路斯人民自己。正是本着这一立场，我们投票支持了二十九届联大通过的3212号决议和安理会365号决议。为了按照上述决议精神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首先就必须坚决排除超级大国的插手和干预。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腊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我们对于塞岛两族人民的痛苦遭遇深切同情。我们对塞浦路斯两族的谈判一直表示关注和寄予希望，对通过谈判开始取得的某些进展表示高兴。尽管目前出现了暂时的困难，我们相信，

只要塞浦路斯两族及有关方面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涉，并以大局为重，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和平途径，互谅互让，耐心协商，采取积极的态度，消除而不是扩大分歧，塞浦路斯问题就能够最终得到合理解决。

斯卡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安理会今天开会审议如何重新振作并鼓励朝向塞浦路斯和平的运动，到今天，朝着这项目标的进度并不符合本理事会二月前赞同岛上二族谈判时的希望与期望。

在塞浦路斯，要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努力基本上是它们自己的责任；但是安全理事会有重大利害关系要鼓励这种努力。因而，去年七月间，在岛上战斗爆发后，安理会就达成一次停火、为在日内瓦谈判创建了构架，并且设定了指导谈判的原则。八月间，在谈判破裂以后，安理会赞同了二个社区代表在秘书长及他代表主持下的接触，我们敦促：这些谈判不仅应该处理当前人道上问题而且应该处理政治问题。

在十一月间，大会在它第3212(XXIX)号决议里嘉许了二个社区代表间的讨论，并且促请他们继续下去，目的在达成一项双方都可以自由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大会强调，塞浦路斯的未来宪政体制是这两个社区的事。安全理事会在十二月间赞同了该项大会决议。最后，在举行这些谈判的整个期间内，秘书长通过他在尼科西亚的干练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为谈判的成功提供了各种的鼓励。

这些行动就为我们审议目前塞浦路斯局提供了基础。我们既然已经设立了一个使谈判解决成为可能的构架，便对任何使寻求解决方法变成为复杂性的单方行动——例如宣布在塞浦路斯的一个土耳其联邦国——都表示遗憾。

因而，我国政府在二月十三日声明，美国“…对今天所宣布的行动表示遗憾，我们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且一直设法阻止任何一方会使达到和平解决的各种努力复杂化的一些单方行动。我们相信，

对塞浦路斯问题任何最后的解决方法必须经由一项谈判过程——一项现在正在进行的过程——去找到。国务卿基辛格在同一天又说，‘美国继续承认塞浦路斯政府为塞浦路斯的合法政府’，又‘美国将作出一切努力来鼓励和平解决’”。

我们相信，秘书长同他在塞浦路斯的代表在促进直接有关的人达成和平解决的努力中一直担任并且还会继续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特别受到鼓励地注意到了秘书长在二月二十日给安理会的声明中说，他准备在新的条件与程序下促进继续谈判，这就对今后进展提供了合理希望。我们促请希腊和土耳其政府——二个我们所重视的盟友——和塞浦路斯政府——我们与它有长久友好的关系——来对秘书长适时的倡议作出积极的响应。

就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议事来说，我们对于这次辩论的严肃认真印象深刻，这足以反映出来各方及安理会对所面临各种问题的复杂及微妙，具有清晰了解。在这大厅内进行讨论的气氛表示出来对一项重大事实的认识，也就是：在安全理事会处理国际和平及安全的重大问题时，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实事求是的对话。

为了寻求可以鼓励及促进解决方法的一项决议，现在正在积极地推进非正式的协商。安理会的成员可以放心：美国在谈判并拟订一项对安理会成员也对有关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决议的各种努力中，准备作出有建设性的合作。

我愿强调地重申：美国的利益所在是一项和平并经过谈判的解决方法，以由本安理会和大会所宣示的原则作为遵循，并且基于正义、尊严和自我尊重。我们相信，这种解决方法只能通过各方之间自由谈判而达成，而不是通过外界的命令。我们促请所有有关方面重申它们对这种探讨途径的承诺，并就这种解决方法重新献身以赴。

主席： 我请土耳其的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除了每两年定期开会以延长联塞部队的授权，安全理事会这一次在没有紧急情况、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开会议论塞浦路斯问题是很少有的事，或者还是第一次吧；简单地说，对我们而言，这次开会没有正当而充分的理由。

我们之所以来这里开会，是因为某些人不顾显然严重的后果，妄图制造混乱与危机。塞浦路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发生了军事政变。发动者是当时的希腊王国和在塞浦路斯岛上的塞浦路斯希腊族集团。政变的目的是要撕毁由国际协商而成的妥协方案，由两族组成的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就是根据这个妥协方案成立的。这一连串有时被人极无知地加以简化而称之为不幸的两族间暴力的事，又在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七年重演；在一九六七年时，有25,000塞浦路斯土耳其人成为难民并被贬到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二等公民的地位。

从血腥的一九六三年圣诞夜到血腥的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早晨这段时期中，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和作为保证国的土耳其作出了巨大的道德及物资上的牺牲，以求找出解决问题的和平途径。整整十一年艰苦的岁月，十一个长久的年头，我们都真正在寻求办法，既没有一个国际会议的建议，也没有一个事实调查团的建议，我们仍然寻求办法。尽管不时有人对我们表示同情。但我是孤独的。

别的事都暂且不谈，我们做到了一件事。我们保持了塞浦路斯的独立。希腊现任国防部长、希腊的大政治家阿韦罗夫先生自己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接受雅典《今日新闻》报访问时，就说明了这一事实：

“我们要求希塞统一。希塞统一的要求无论在道德上、理智上和实效上，从任何一方面说都是应有的目标。谁在想避免希塞统一呢？就是土耳其对希塞统一的顽强抵抗。如何对付土耳其的这个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就在塞浦路斯进行谈判。六年以来，因为在岛上的土耳其族力量薄弱，而土耳其的耐心又显然受到了误解，使得塞浦路斯希腊人这一边态度特别强硬。无论这是由于谈判代表或他在莱夫科西（尼科西亚）的领袖或他们在雅典的主人的不让步态度，土耳其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在那六年里，土耳其族的要求比克莱里季斯先生以塞浦路斯驻守总统身份拜访登克塔什先生时对后者提出的允诺要少得多。克莱里季斯先生来得太迟了，整整迟了十一年。

桑浦森的军事政变是希腊所犯错误中最近的一个，但也是最有决定性的一个。那些把土耳其的忍耐看作无能为力的人知道他们是弄错了。我现在不愿意谈土耳其为什么和怎么样干涉。但是既然我们正在谈这个问题，让我再一次用最明白的辞句声明，我国政府绝不怀疑它行动的合法性。自桑浦森军事政变后，在日内瓦会议期中和会议以后，六年来在两族谈判中以土耳其族力量薄弱和土耳其的忍耐为可欺的希腊那一边，现在又想把土耳其这一方在战场上的优势转化为弱点。他们的规则只有一条：在战场上占上风的那一方无权在任何问题上坚持，不然的话就是炮舰外交，就是要屈辱对方。

只在他被推翻前几个月，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在一家德国无线电台《法兰克福评论报》的访问中说：“假如我能在希塞统一和独立之间自由选择的话，我支持希塞统一。”我不知道他说这些话时是不是也在含蓄地表示对土耳其炮舰外交的不满。知道事实真象的人是不会这样想的。

我非常尊重希腊人民的感情，大家也都知道我确有这份敬意。希腊人民的感情显然是受到了损伤。但是能因此责怪土耳其吗？还是说希腊人民应该责备那些多年来用虚假的希望和不可攀的梦想来刺激他们的想象力与利用他们的民族感情的他们自己的领袖呢？

有一段时间，在日内瓦谈判和接受了最后停火之后，我们闲坐在安哥拉和塞浦路斯，弄不清楚希腊领袖说话的真正意思，当然我是在说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因为有一位自称是共和国流亡总统的领袖坚决拒绝用联邦的办法来解决，而另一位代理总统的领袖正公开谈到从前对塞浦路斯土耳其人不公正的待遇，并表示愿意接受一个由两个地区组成的联邦。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机会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进行谈判了。但是到那时

候希族塞人的谈判代表又拼命抱怨说他没有获得授权，并且很坦白的表示，即使他会答应的条件，也可能被别人收回。所以他们就都到雅典去。他们和希腊政府商量之后再回到岛上来——所有这些都是在独立和不结盟的幌子下进行的。

希族塞人的谈判代表仍然没有获得谈判的授权。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在一个星期多一点后才得到他领袖的许可；而这同一位代表，同一位可敬的绅士，今天却在这儿想掀起国际反应，宣称在不到四星期的谈判中不曾有任何进展。据他自己告诉登克塔什先生，他在谈判中取得的任何解决办法都要经大主教批准；我们从他这话才知道他获得了授权。总而言之，他在谈判时答应的东西，又有别人可以收回。可是要去问他们的话，他们说这段时间全是土耳其在拖延不肯谈判。

在第一次会议上，希腊方面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意见：要撤销现有的保证，或者最好换一个新的保证。就土耳其方面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并且我们要告诉所有寻求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人，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事。

于是谈判就暂时停顿了。由于双方共有的某些诚恳的朋友的可贵的努力，土耳其方面决定在这点上保留它的立场，暂时把问题搁起，以使谈判进行下去。如果你去问希腊方面的话，又是土耳其在拖延时间了。但是也有人会认为，土耳其暂时不讨论这一非常重要问题的决定，也可以算是推动谈判破除障碍的一种善意的表示，并借此促进双方的信赖。理事会各理事国不妨自己作出结论。

对塞浦路斯问题实质的谈判是一月十四日开始的。从那天起，谈判代表们每星期会谈两次，一共举行了八次会议。这八次中有一次没有作实质的讨论，因为谈判代表们去土耳其占领区走了一趟，调查克莱里季斯先生收到的一项关于200人失踪的报告是否属实。结果证明这项消息是错误的。

因为在谈判中双方都需要宪法专家作顾问，双方同意把议程中关于宪法的讨论暂时搁置到这些专家到达后再谈。这样一来，谈判时讨论的唯一项目只有莱夫科西机场再开放的问题。希腊方面曾就这个问题多次直接指控土耳其。这些指控主要论点是说土耳其——或者更明确一些，外交部长埃森贝尔——撕毁了已经达成

的协议。这是一个谎言。从来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不偏不倚的熟悉谈判内情的人士都知道，也向我们这样表示过。

在最近一次理事会会议上，我们听到关于机场问题讨论的一个相当可笑的报告。我必须向理事会各理事国声明，如果我们不想讨论某些题目，土耳其是够懂得世故人情的，不必用小丑的办法就能办到。可是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代表切里克先生已经对这件事作了相当详细的报告，不须我再多费唇舌。土耳其方面所提出的关于机场和马古萨港（法马古斯塔）的再开放以及关于释放若干希腊人回土族塞人占领区的许多具体建议，也是同样的情形。

为了把这方面的问题说清楚，我要再加一句，就是在这段时期，土耳其已撤退了一旅在岛上的军队。而不幸地，这些并没有引起希腊人方面的兴趣。

在同一时期中，关于希腊方面的意图倒是有许多透露。我将按时间先后向理事会报告在这段时期中发生的事。就从一月二十七日开始，还不到一个月以前。当天，大主教只在四次会议之后，便宣称谈判毫无成就。

一月二十九日，雅典新闻社报导说，就塞浦路斯问题而言，二月和三月是个紧要关头，因为希腊方面所要采取的一些行动可能招致土耳其的反应——这是一篇莫测奥妙的报导。

一月三十一日，全国委员会——当然，在塞浦路斯所谓“全国”就是“希族”的意思——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主持的召开。会议后的正式声明宣布说，“我们审查了情势，因为看到当地的谈判缺乏进展，所以对如何进一步处理这些事务达成若干结论。”希族塞人的报纸也报导说，政府将不再采取消极的态度，而要着手一个国际性的攻势——我猜想这个会议也是攻势的一部分吧。

同一天，希腊部队使用重武器向在莱夫卡区的沙姆里克伊居民开火，造成了重大的违反停火事件，当地联塞部队负责人证实了这个违反停火事件，可是我觉得很遗憾的是秘书长最近的报告里没有提到这个事件。在这里，我希望秘书处以后注意，使联塞部队与纽约之间在报告方面取得更好的协调。

二月一日，希族塞人在莱夫科西机场附近造成重大违反停火协定事件。联塞部队证实确有此事，但声称因天气很坏，无法认定谁是挑衅者。

二月三日，大主教举行记者招待会，要谈判在四星期之内谈出结果，不然的话，他说他就要采取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切可能途径。

二月五日，很奇怪地在所有这些违反停火事件及所有这些塞浦路斯谈判无进展的声明发生之后，由于美国俚语里所谓希腊院外活动集团的推波助澜，美国停止了给土耳其的军援。

二月七日，克莱里季斯先生在会谈后告诉登克塔什先生，在下一次会议上他要提出他那一方面对宪法问题的建议。在二月七日到九日之间，某些人在莱夫科西（尼科西亚）的希族区制造人为的紧张气氛。联塞部队进入警戒状态。后来证明这些全是假的。

二月十日，登克塔什先生要求把他和克莱里季斯先生的会谈延期，以便他也能准备土耳其方面的反建议。

克莱里季斯先生把他的建议用信件送达。同一天，希腊的卡拉曼利斯总理向希腊议会议演说道：如果土耳其不接受这个计划作为谈判的基础，雅典与尼科西亚——就是那个在尼科西亚的不结盟政府——就要会商寻求另外的办法。

在一月十九日和二月一日之间，希腊和希族塞人部队方面违反停火十四次。

以上只是一些有关的事实。意图非常清楚。希腊方面最初是希望乘美国切断对土耳其军援的机会取得些好处。正如一个独立的观察家所说的，如果在那时候把整个塞浦路斯双手奉上，塞浦路斯希腊人也不见得会接受的。

在那个希望落空之后，他们又换了别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诉诸联合国，以图获得一些政治利益。

就是不在现在这个时间开会，我们都知道安全理事会原来也是要开会的，因为正如我在前面讲过，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本月三日很慷慨地给了土耳其和希腊的谈判代表——我应该公平说话：他对在塞浦路斯的双方代表都给予四个星期的时间，

去解决整个复杂的塞浦路斯问题；不然的话，他说他就要采用一切可行的途径，包括告到安全理事会去，使问题国际化。他这样做，大概是忘记了，使他回到他自己人民去的安排也费了四星期多一点的时间。

紧接著这件事之后，他就通过他的谈判代表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下。他只简单地命令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回到他们的围地去，不过现在他把围地换了个名字叫“州”，这就是他大让步的一部分。他又再度表示要撤销现有保证的意思——所有这些都要在四星期内完成。

我必须说明，他的提议绝不是土族塞人能接受的。连希腊人都很明白，这些提议的目的只是想打断两族间的谈判，由此给希腊那一边久寻未获的借口，到纽约去告状。这个几乎完美无缺的计划很可能是共同路线的一部分，这个共同路线据说是几个月以前当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以他的不结盟国家的元首身份拜访他的结盟的主人以求得重返塞浦路斯的护照签证时在雅典决定的。当事态发展破坏了这个总计划时，不结盟塞浦路斯的不结盟领袖又被他在雅典的结盟主人召去，给了他新的训令，于是我们就到这里来开会了。

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一种真正协商的精神。在我们看来，这只能增加塞浦路斯人民的痛苦。希腊人怎样处理他们自己人民的利益是他们的事，但是可不能希望土耳其这一方面在这希腊人制造的混乱中也袖手旁观。因此，土族塞人行政当局采取了在这种情况下非采取不可的步骤，转而注意它自己人民的需要。于是就改变了土族塞人的行政组织，宣布成立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

假如一定要谴责什么的话，不应该谴责这一件纯属土耳其族内部的事，反而应该谴责使这件事非发生不可的希腊的不负责的行动。土族塞人成立联合邦的决定并不就是单方面宣布独立。它并无意寻求任何国际承认。事实上，国际大家庭承认在塞浦路斯上有一个土耳其族的存在，具有平等的权利。这就够了。他们怎样管理自己是他们的内政，不需要任何人插嘴，包括希族塞人那一边在内。

有人想把土族塞人的决定宣传为一个政变，好象认为塞浦路斯岛上本来一切正

常。 政变是相对于某种宪政体制来说的。 塞浦路斯没有宪政体制已经有多久了？

对希腊方面所认为的宪法发动最近一次政变的人，是国际闻名的罪犯，这个人现在仍逍遥法外，身体健康，还到处演讲，出版他的回忆录，赞扬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和希塞统一运动的英雄。 在桑浦森政变之前整个塞浦路斯有没有一个宪政体制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塞浦路斯代表团本身正是这种缺乏宪政体制的象征。 我很想知道，这个代表团自称所代表的已成立了十多年的政府是根据什么宪法成立的。

大主教在今年一月十四日委派了一个部长会议，这是在他自一九六三年以来所派任的一长串会议名单上再加上一个，而这个会议事实上又把土耳其人排除在外边。

根据这一个他们有时仍然认为有效的宪法，百分之三十的内阁席位应该保留给土族塞人。 有多少土族塞人的代表在所谓塞浦路斯议会中占有席位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参加过塞浦路斯的议会或内阁或外交代表团呢？ 根据宪法，最高宪法法院应该由一位中立的法官任首席法官，现在又怎样了呢？ 根据宪法，塞浦路斯的军队只应该是一支 2,000 人的象征武力，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全部由希腊人组成的几万人的军队，而且改名叫做“国民警卫队”？ 是什么国家，是什么警卫队？ 警察武力怎样了呢？ 土族副总统的否决权怎样了呢？ 十年来有没有向他咨询过？ 在“政府”决定请求安全理事会举行这次会议之前，有没有问过他的意见？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能表明塞浦路斯过去十年来和现在所存在的宪政程度。 塞浦路斯的确发生了政变，但政变不是发生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不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甚至不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 政变早就发生了，在一九六三年圣诞节。

塞浦路斯的宪政体制正是被突然在这里变成高擎宪法旗帜的人的那些绅士们破坏的。 而置这些情况不顾，我们十年多以来到安全理事会来倾听塞浦路斯希腊人和大陆上的希腊人的各式各样的控告，包括塞浦路斯土耳其人没有付电费。 这是多么荒谬的事！

十多年以来，塞浦路斯岛是一块没有法律，没有宪法，充满扰乱和不公正的土地，要数违法违宪，最不该算的就是新成立土族联合邦，这个联合邦的目的是和它的希腊族邻居联合，在将来成立由两个地区组成的塞浦路斯联邦。我希望这个联邦会是合乎宪法的而且得到尊重。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宣布成立绝没有任何违背联合国决议的原则的地方。

现在，容我对希族塞人在交给登科塔什先生最后一份文件中所提的一些建议作简短的评论，因为这些建议似乎很可说明他们统治阶层的想法。克莱里季斯先生在他提议的第(3)和第(4)段中谈到在尼科西亚——凯里尼亚，莱夫科西——吉尔内这条轴线两边延伸到海的在北部的一个假想的土耳其区，以及主要位于土族塞人村庄集中一带的数目未定的一些土耳其地区。据希腊报纸说，这些区域的数目在九个到十二个之间。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拜占庭的传统的话，我们还以为这些想在地中海之中建立“班图斯坦”的提议是由南非或南罗得西亚的一些种族主义的和法西斯的领袖们设计的哩。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之下——这个中央政府当然是由希腊人控制——，只要土耳其的军队撤离岛上而又撤销了现有的保证，这些分散的土耳其州在短期之内就会被大主教消灭掉，以实现他求得希腊精神更大光荣的最终目的。

在土耳其这一方面，我的意思是指土耳其和土族塞人，有两个原则是绝无妥协余地的。这两个原则就是，第一，塞浦路斯应该是一个由两个地区和两族组成的联邦，第二，根据国际协定宣布的现有保证要继续下去。其余的事都是可以商量的，希腊方面只要看到这些事实，真心开始谈判，他们就会了解土族塞人是能够把整个塞浦路斯的利益放在任何其他考虑之前的。

我从安全理事会某些理事国的发言中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在担心自从二月十三日的宣言之后，使塞浦路斯分裂的可能越来越大了。我要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忧虑是毫无根据的。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已经把他们对分裂和对希塞统一的态度一次又一次地表示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仍有帮助的话，我十分愿意再一次肯

定我们的态度。我也希望我现在就这个题目所说的话能满足由苏联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马立克大使所提出的苏联的具体要求。首先我要重复当时土耳其外交部长在联大所说的话。他说：

“我代表土耳其政府谴责不管是过去的或将来的任何分裂的主意。”现在我奉我国政府的训令再度要求列入记录，土耳其政府绝没有分裂塞浦路斯的意图。事实上，作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的保证国，土耳其将坚决抗拒任何别国分裂或吞并该岛的企图。此外土耳其政府愿重申对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支持，它对该决议的了解仍与该案表决当时土耳其外交部长所申明的一样。土耳其深信，在平等基础上恢复塞浦路斯两族代表的会谈和由此种会谈所获得的进展，会造成一种导致上项决议全部执行的气氛。

我原来希望用最平心静气的态度在理事会里讨论整个事件。那时我还没有完全体会到本市新闻机构所布置的许多陷阱的厉害。从去年夏天开始，这许多船运大王、实业界巨头、有钱的专业人员和好几百万的希裔美国人对减轻地中海区紧张局势所作的贡献是难以胜数的。我希望这会议桌上的同事看一下今天的《纽约时报》。我真要敦促他们去念一下。这份报纸比许多在这里对事实的暴露更使人了解塞浦路斯问题，甚至更使人了解一切困扰著土希关系的问题。在选辞用语上所表现的刻毒仇恨与对事实的歪曲和过份简单化，是令人吃惊的，在美国全国和在任何一个有相当数目希腊人而这些人又付得起钱的国家，而通常他们都能付得起的，每天的新闻里都有数以百计的这样的报导，这份报纸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他们的教堂与讲座所发出的文献和教导中经常充满了这种仇恨。这是使人悲伤的事，使人沮丧的事，从人道的立场来说，使人觉得羞耻的事。但是这对我们土耳其人必然是也的确是一种警告。

我相信马立克大使在他长久而杰出的经历中一定碰到过这样一小撮死硬的亡命份子，他们坚持要把列宁格勒这个美丽的城市叫做“圣彼得斯堡”或“彼得格勒”。

这样的人人数很少，我们不妨把他们当作怪人看待。象“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虽然已经过了五百多年，希腊人的嘴唇一提到它仍会发痛，他们的笔也仍然写不下去。看一看今天出版的《纽约时报》吧。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有时就在这个会议厅里，当有些塞浦路斯希腊人突然发脾气时，我也曾悲哀地看到。

要了解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反应，就必须考虑到上述的心理状态。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受这种心理状态的任意播弄已经很久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能也不会恢复到塞浦路斯以前的状况去。这就是为什么塞浦路斯必须是一个由两区组成的国家，一个联邦国家；在日常生活上把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分别隔离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内，这是土耳其人安全所必需的。这就是为什么塞浦路斯土耳其人不能也不会承认一个以总督为首的希族政府可以代表整个塞浦路斯。大家以一种新的、建设性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越早了解到这一点，塞浦路斯——这是许多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的共同的希望、善意、现实主义和政治家风度所创造的——在这么多年之后就越早能符合它诞生时的期望，一个真正独立而不结盟的国家，诚心的为两族的共同福利服务，这两族平等地分担国家一切事务。除此以外，我认为其它都只能是空谈。

说到这里，我想谈一下我的希腊同僚卡拉扬尼斯大使在这次安全理事会一连串会议中第一次会议上的一些声明。

在联合国每一个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场合，希腊人总做出悔悟的样子，承认希腊过去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犯了错误。卡拉扬尼斯大使甚至声明他的政府在合理的范围内愿意付出代价。我听得懂他的话。但是我向他保证，土耳其并不打算要希腊付出什么。过去十一年中希腊的错误已经由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偿付了。代价付出了就算了。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使希腊不再犯错误。我们要保证，就是希腊想犯错误，它也没有机会去做。

我们这样想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很抱歉地说——这样说并无贬抑的意思——希腊很容易犯错。从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二年它判断错误——然后为这些错误付出了代价。在塞浦路斯它在一九六四年犯了错，一九六七年重犯一次，一九七四年又重

犯一次——然后为此表示歉意。 我们完全宽恕它，但是我们不应该健忘。

我们来看看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先生最近在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在电视广播中说了些什么，这次谈话也由雅典无线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在八月二十五日转播：

“塞浦路斯人啊，一个思想，一个名词，就会改变你的精神，重整你的力量。这个词就是“希塞统一”。 你不能有别的思想，因为希腊精神永在。”

这话是在一九七四年八月说的。 从那时候之后，希腊的外交部长和卡拉扬尼斯大使曾先后在联合国这里谴责“希塞统一”，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但是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必须宽恕，可是我们不应该健忘，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

为说明我这话的意思，我要再引述卡拉曼利斯先生在二月十三日土族塞人宣言后的声明。 他说：

“希腊政府自接管以来完全遵守国际法并表示愿意协商解决，现在希腊政府向世界谴责土耳其的军事政变并保留它在受攻击时保卫希腊精神的神圣权利的权利。”

如果卡拉曼利斯先生在二月十三日宣言之后所说的希腊精神就是他在去年八月所说的希腊精神，这问题就严重了。

希腊大使扬言土耳其常常背著塞浦路斯人与希腊人接触以图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不想提出什么名字来，使活著的人难堪，或使已死的人名誉受损。 我恳求我的希腊同僚们不要迫使这样做。 可是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必须说出来希腊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们曾向他们的土耳其对方为此作过许多接触。 我恰好也知道许多企图要在塞浦路斯制造——说得客气一点——我姑且只说是非法的情势。 这些企图既不是土耳其的目的，也非土耳其能力所能做到的。 我在我国外交界担任过好几个不同的职位。 在每一个职位上我都可以回想到一些这样的事。 所以，请不要再提这些指控了。

我的希腊同僚声称他是非常反对外交欺诈的——我相信他的声言是诚恳的——可是他却在他的声明里冒昧地向这个理事会的理事国提出警告，暗示说雅典将密切

注意理事会各国所要采取的态度，并将据此采取必要的因应。假如我也学他的办法，理事会各国就真要难于选择了。我认为这实在不是体面的做法。

对卡拉扬尼斯大使的声明我最后还要说几句话。我的希腊同僚在他的声明里提到加洛·普拉佐先生这个名字。看来他们是理屈词穷了，才会老是提到加洛·普拉佐先生。我过去已有好几次谈到加洛·普拉佐先生的报告。想知道土耳其对这问题的看法的人，只要查一下理事会过去的记录便行了。但是我要乘此机会表示，加洛·普拉佐先生的报告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土耳其一无所损。这份报告除了是希腊方面引证的好材料但是引证得少有效果之外，我看不出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认为加洛·普拉佐先生的这份报告只对一个东西有影响，这东西就是联合国。我怀疑再多有几个加洛·普拉佐，本组织还能不能继续存在。

已经有好几位代表发言，表示他们的国家比较喜欢那一个是现在塞浦路斯的合法政府；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政府首长的姓名也提了出来。我国认为这些声明都属于干涉别国内政的范围。我们认为，除了生活在那个国家的人民，别人不应该决定那一个是该国的政府，在提出姓名时，尤其如此。当然每一国都有自由决定它自己的行动，决定那种是或那种不是干涉别国的内政。

最后几句话——已经讲了这么久了，我要向大家道歉。

跟著安全理事会现在的辩论，当然会有一个决议。事实上，我知道广泛的协商正在进行著，而且我这样说也不算泄漏任何秘密，那些自己觉得可以提出决议的国家已很周到地咨询了有关方面的意见，虽然我们不是理事会的理事国，在最后通过决议时也没有发言权。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要说得很坦白、很率直。

当理事会决定召开会议时，理事会的理事国可能有两种想法。他们可能觉得对二月十三日的宣言应该表示遗憾和痛惜。假如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当然有权这样做；而我呢，既不是理事国的代表，就只能恭敬地站在一旁做一个旁观者。另一方面，理事会的理事国可能觉得他们的责任是要造成一种可以导致塞浦路斯两族恢复谈判的环境。如果是这样的一——我希望是这样的一——

各理事国当然了解谈判至少需要两个方面，因此之故，只通过一方面的意见是无法为有意义的谈判创造条件的。

理事会的每一个理事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都可能已采取了适合它自己的看法、它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方式或它自己的利益的政治态度，而这个态度至少常常和争执中的一方的观点是不一致的。所以要执行决议中这些不一致的地方是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的。另一方面，找出争执各方共同的观点来，应该有助于达成我们都希望获得的结果。在我看来，这是安全理事会现在要肩负起来的最沉重的责任。当然，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决定和判断都是理事会自己的事。

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主席先生，我首先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对您担任安理会本月主席职位致以热烈和诚恳的祝贺。由于我们两国代表团的友好关系，这些祝贺就觉得更为热烈；我们两国代表团的友好关系反映了在贵国——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我国——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和有效合作。您从第三世界人民与国家的解放斗争事业中获得的丰富的国际事务经验和政治家的才干，是对安理会本月工作成功的一个保证。

我也想向白俄罗斯代表致以理所应得的敬意；他在上月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替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光荣。

因为这是我自年初以来在安理会正式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意大利、瑞典、圭亚那、日本、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祝贺他们的本国当选为安理会的理事国。我想请他们各自向他们本国的政府转达毛里塔尼亚政府的敬意；因为大会对他们充满信心而把这一项微妙和艰巨的工作交托给他们。我深信他们在联合国的长久和丰富的经验将有助于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成功。

我现在想转到我们一直在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塞浦路斯局势。先前的发言人已在他们的发言中强调了塞浦路斯局势的严重性；这个局势随时可能恶化成为一个后果无法估计的冲突。

联合国秘书长（我想在这儿向他致以十分应得的敬意，因为他向我们提交了一个客观的报告书）当然已经提请安理会注意应该采取的紧急和有效措施，以便防止塞浦路斯共和国再度成为冲突的场所，而这种冲突只能造成塞浦路斯居民无法形容的痛苦和人命损失。

我国代表团因此不能不对塞浦路斯危机的持续表示深切的忧虑；这个危机一天比一天更加威胁到这个不结盟国家，这个联合国的十足资格成员国的团结、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国代表团，我们本国和政府所支持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已替直接有关各方恢复谈判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构架。

虽然这些决议没有得到实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我国代表团相信这些决议今天仍然是恢复两个社区间谈判的一个可以接受的构架。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必须让塞浦路斯人自己来消除彼此间的分歧。

任何不是由于有关双方相互接受的协议而起的外来干涉，只能拖延危机的解决。我国代表团忠于独立、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这些理想，对一些外国干涉塞浦路斯内政的事只能表示痛惜。这些国家现在应该明白，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利益和它们自己的利益在于审慎地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不用说，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前途在于它的团结；而两个社区的最高利益是要为达到团结这个目的去谋求各种方法和途径。

我想对塞浦路斯共和国代表的远见和他们积极参加安理会的辩论致以十分应得的敬意。我深信常识和理智终久必会胜利；并且塞浦路斯共和国也会在联合国的范畴内，继续给我们带来它累积数世纪的历史和文明所得到的宝贵经验；这个文明这么多年以来作出了那么多的贡献，把各种人民文明和文化融合在一起。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罗马尼亚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请他发言。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想先向您和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表示感谢；感谢你们让我向联合国的这个重要论坛致词，并让我在这儿表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对本次辩论的主题——塞浦路斯局势所采取的立场。

我们请求让我们参加辩论，因为我们深信联合国的成员国应负起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并且每一个成员国有责任帮助联合国为所审查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关于塞浦路斯局势的演变，由于塞浦路斯位于和罗马尼亚相近的地理区域之内而且我们和该国保持着一种友好合作的关系，所以我国对塞浦路斯坚持不懈的关心就更加容易体会了。

众所周知，自从塞浦路斯冲突爆发那天开始，我国政府曾始终一致地说明态度，坚决支持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尊重。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认为塞浦路斯问题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因此，我们曾明白表明赞成停止在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上的一切军事行动和一切干涉行动，以及立即撤退岛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这样，才能为两族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情形下，在法律上充分平等的基础上，彼此和平共处和趋向繁荣进步的自由发展，创造必需的条件。

最近，我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曾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一届大会上重申我国对塞浦路斯所采取的立场，他说：

“我们深切地关心在塞浦路斯所造成的局势；我们坚决支持以政治手段解决这个局势。我们支持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我们又支持两族间的和平合作。这是符合所有塞浦路斯工人和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利益的；这将会促进在巴尔干半岛，在地中海，在欧洲和在全世界的合作与和平事业。”

罗马尼亚政府曾以赞同的眼光十分密切地注视联合国所采取的种种行动，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和他的特派代表的不懈努力；这些努力都是用来促进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解决的。

有关这方面，我想和先前的发言人一道，表示对联合国秘书长的种种努力至为敬佩，并鼓励他继续行动，以便使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的各项决定和提议得到实行。去年我们参加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并且支持了后来通过的决议。

罗马尼亚过去曾认为，而且现在仍认为，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一致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对于为解决塞浦路斯危机创造必需的条件是一个巨大贡献。国际大家庭有正当理由相信，安全理事会一致认可的第3212(XXIX)号决议的条文将会得到一切有关各方的遵守和施行。

我国仍然觉得第3212(XXIX)号决议包含着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必需的因素。该决议确立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程序，那就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由两族

代表进行谈判。这些谈判的目的应该是在两族的基本和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在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基础上，拟定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法制度。

为了使两族间的谈判能够完全自由与平等地进行，第3212(XXIX)号决议又要求一切外国武装军队从塞浦路斯共和国迅速撤出，并要求停止外国对其内政的一切干涉。

根据这一个联合国文件的规定，所有难民都应该准其安然无恙地返回家园；有关方面并奉命采取措施来达到这个目的。

四个月之后的今天，我们抱歉地注意到第3212(XXIX)号决议并没有得到尊重或实行；更糟的是、土族塞人的领袖悍然违反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已决定宣布塞岛北部为一自治联合邦。这项决定把塞浦路斯局势弄得更形复杂。因此，有人在两族间的谈判和会话方面建立了新的障碍；而谈判和会话本来是要在完全自由，没有任何种类的压力或单方面行动之情形下进行的。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已对希腊政府、土耳其政府、塞浦路斯政府以及联合国的秘书长采取了某些外交探讨途径；在探讨中我们对塞浦路斯局势最近新发展的后果表达了我们的关心；而最近的新发展已导致了地中海地区和巴尔干地区紧张状态的进一步加剧。

罗马尼亚方面和塞浦路斯共和国保持正常的友好合作关系。罗马尼亚只承认由马卡里奥斯总统领导的合法组成的塞浦路斯政府。

罗马尼亚政府曾一再强调，要避免冲突升级，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是避免任何武力行为或任何片面措施。

联合国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实施这些决议。为此，安全理事会似乎有必要在本次辩论之后，采纳各种措施来鼓励各方面继续努力，以便能在一个建设性的政治对话的骨架内，取得解决争端的办法；并且继续为恢复两族间的直接谈判而

努力，以便拟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反映所有塞浦路斯人的愿望和基本利益的国家结构。双方有可能选择联邦国家的形式；然而，这个解决办法应该是他们双方自由协议的结果，而不是单方面采取措施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有需要来审查新的手段和各种可能性，使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能够对有关各方间的谈判成功和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作出它们的贡献。关于这方面，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到一个事实：在过去十五年来，我们曾试图在一个局限性的范畴内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得到的结果是尽人皆知的。

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只有由一切有关各方的参与和积极努力，才能取得解决国际问题的持久和公平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尼亚政府认为凡是深切关心塞浦路斯冲突的紧急和公平的解决各巴尔干和地中海盆地国家，都应直接参与问题的解决。这样，这些国家可以提供有效的帮助来消除在世界那一部份的紧张的温床，并来创造所需的条件以确保塞浦路斯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能够以独立自主的国家谋求发展。

和平与国际谅解的条件需要有关各国一致努力，来鼓励和缓在世界那一部份的紧张状态，以便通过谈判，取得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持久办法。不用说，这样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将会对巴尔干各国间和地中海盆地各国间的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并且有助于将世界的这部份转变成为一个和睦相处，和平共存的地区。

最后，我想表达罗马尼亚的坚强信念：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有关各国的参与和直接帮助下，会不辞一切努力并尽力采取行动，以便尽快地取得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

罗马尼亚政府方面将和其它有关国家一道，本着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依照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合法愿望，又依照在这个地区，在欧洲和在全世界取得持久和平的各种迫切需要，尽力为塞浦路斯问题的持久解决作出贡献。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发言人了。现在有三位代表要行使答辩权。第一位是苏联代表，我请苏联代表发言。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十月革命之前，当革命前夕的俄罗斯沙皇政府在政治上胡作非为的时候，著名的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家利奥·托尔斯泰说：“我不能保持缄默。”当占有安全理事会主席席位的中国代表胡说八道时，我作为苏联代表也不能保持缄默。

我在欢迎中国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曾说：

“主席先生，我们亦想祝贺您担任主席席位，并希望您工作成功；特别是希望安理会在您的主持下，能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通过积极的决定。”（第1813次会议，第91页）

听取了中国代表有关塞浦路斯的发言后，我已断定这是空的希望。我们等待并且希望您的继任者哥斯达黎加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会就安全理事会对讨论中的事情取得积极的结果，采取较有建设性的态度。

当然，自然发生的一个问题是，在所有联合国的机构中，您和您的同事究竟还要继续多久用“两个超级大国”的陈腔滥调来投机取巧，以便掩盖您个人方面和您的领导阶层的反苏主义病态。根据我手头上的可靠资料，这已经使联合国的成员国和它们在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开始闻而生厌。没有提出过任何有建设性的主意，没有提出过任何积极的主意；一切都是被否定，一切都是被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批评；而且这一切都是用病态的反苏主义和对苏联政策的诽谤来掩饰。可是我们有一个很中肯的俄国谚语说：“诽谤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我们以此自豪。我们的政策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正是由于苏联和它的朋友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我们才能说服那些跟我们住在同一个大陆上的人民；他们应该采取措施来把欧洲转变成为一个和平与安全的大陆。您也不喜欢这件事。您反对欧洲的和平与安全。您挑拨西欧反对苏联。可是，您是不会成功的。您已养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您提到两个“超级大国”；然后就其中之一略说一两句话，例如您今天就是那样说的。您说其中一个在幕后扯“线”操纵塞浦路斯问题。这些是很结实的线，可是您却对此默而不提。然而，您对苏联则套上一大堆诽谤，

并且凶狠地歪曲它的政策。

任何不明塞浦路斯问题实情的人听了您今天的发言，还可能得到一个印象，以为引起塞浦路斯事件的责任不在于那些组织并扇动塞浦路斯军事政变的人，不在于七年来对实行政变者予以支持和装备的那些人哩。而且责任看来也不在于那些干涉塞浦路斯内政的人，不在于那些把军队驻在岛上不走，不理会安全理事会决定和大会决议的人；正如您在发言中所说，您是赞成并且显然投票支持这些决定和决议的。

依照您的说法，责任既不应该在于那些在塞浦路斯维持军事基地的人，也不应该在于那些曾一度强行向塞浦路斯作出各种保证的人；而这些保证不是用于确保塞浦路斯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这个目的，却是用于与这个全然相反的目的。依据您的纯粹的中国人说法，这些国家几乎成了保护塞浦路斯的天使了。依您的看法，这一切的责任主要在于一个重要的超级大国。明显地，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您心目中指的是苏联。

可是苏联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各人都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塞浦路斯人民的悲剧出现和延续的历史，并且看到谁是有罪和谁要负责任。在一件极为明显的事情上，您正企图哄骗安理会、联合国、各国代表、各国代表团和全世界的舆论。

正如我已指出的，苏联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已采取了一个正确和公正的立场。自从塞浦路斯危机爆发的真正头几天开始，苏联就一直坚决赞成立刻恢复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赞成立刻恢复它的不结盟地位；赞成联合国积极参加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赞成召开一个广泛的国际会议，以便导致一个公正的政治解决；又赞成给予塞浦路斯真正有效的保证。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为此而自豪。

您提出了什么呢？一点也没有。您只是在帮忙那些想分裂塞浦路斯的人，在帮忙那些将它保持为战略基地的人。评论也是多余的。

如果我们找来一百个人，甚至找来一百个中国的聪明人，叫他们找出有关塞浦路斯

事件责任问题的一个最荒诞无稽的说法的话，我不相信有谁能比中国代表想出更加离奇的说法了。

在这件事和很多其它事情上诽谤苏联有什么需要呢？这是不难理解的。需要这些诽谤来掩饰中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真正立场。为了促进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中国连一根指头也不想动。反之，中国为局势的加剧而高兴。这是很明显的事。中国在推行一个政策，据说“两个超级大国”正在世界所有各地发生冲突。单看看周恩来先生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吧。他预言美国与苏联之间，美利坚和俄罗斯之间，将发生战争。他这样说，就是说出了他自己及他的领袖毛泽东的幽梦。中国领袖的梦想是使美国和苏联在一场热核战争中互相敌对。可是这不是一个新奇的想法，一点儿也不新。

到了五月，我们将庆祝我们的一件伟大的历史性事件——我曾在安全理事会上关于塞浦路斯的发言里提到这事——那就是，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反抗法西斯主义的伟大爱国战争胜利三十周年。可是当时很有些人要德国把苏联打垮，苏联也把德国打垮。在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战争最烈最紧张的关头，在我们国家的命运最危殆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参议员这样说：“让俄国人把德国人杀得越多越好，让德国人把俄国人杀得越多越好。等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依我们自己的条件左右局势。”一位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作出了类似的发言。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一天从未来到；他们两人现在都不在世了。他们梦想的事并没有发生。

由于反希特勒联盟的各国和各民族的努力，以苏联人民为首的痛恨法西斯主义的各国人民联合一致的努力，法西斯主义被打败了，并且我们将要庆祝打败法西斯主义的三十周年纪念。

我坚信——您可以把这点转告您的领导阶层——他们也不会看得见美国和苏联在一场热核惨剧中冲突，因为你们的梦想是不会实现的。

中国代表曾说，中国和跟塞浦路斯问题有关的三国，那就是，塞浦路斯共和国、

土耳其和希腊，都是朋友。可是，由新闻报导来判断，驻安卡拉的中国大使只说到中国对一方的支持。因此，他们在这儿说一套，在那儿说另外一套。

正如我就塞浦路斯问题在安理会发言时所指出的，安全理事会的四个常任理事国在它们的公报中曾说他们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政府，由马卡里奥斯总统领导的政府。而由它在这里安全理事会上的代表发言的中国对这事连一个字也不提。谁也可以看得出这点。这是一个脆弱的立场。一定要怎样才能掩盖这一点，怎样才能把人们的注意移开这样的一个立场呢？就是用反苏主义。这是很简单的情形，而且我可以说，这是十分小气而且不能使人相信的。

所有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大部份已就讨论的问题发了言的各国，都曾表示支持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及大会的决议，包括撤退在塞浦路斯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中国代表却只字不提撤退外国军队一事。

中国代表竟胆敢——说得温和一点——声言，苏联试图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基地。我可以对你中国代表说：醒过来，张开你的双眼；苏联从来没有，不可能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任何这样的意图。

苏联在将来也永不会有任何这样的意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合国成立后，苏联政府第一个在联合国提出撤销设在其它国家领土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的提案，而且我们一直到今天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个立场；对这个事实我们感到非常自豪。我们曾一再提议消除一切军事集团和一切军事联盟，谁也知道这个事实；你也知道这个事实。我们曾向北约国家提议废除北约组织和华沙公约组织。北约仍然只是在研究这个问题，为此我们觉得很遗憾。可是我相信他们会把这个问题研究完毕，然后我们会终于取得协议来废除这两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

为什么我们在塞浦路斯要一个基地呢？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见到塞浦路斯共和国自由、独立、不结盟和繁荣昌盛，领土完整没有受损。我们诚恳地惋惜塞浦路斯两族之间还没有和平与友好。我们劝告他们吸取我们自己有关保证各民族友好

的经验。 我们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而且都象兄弟般的生活在一起。 我是乌克兰人，可是我却代表苏联——以及苏联领首的共和国，俄罗斯。 似乎本来应该由一位俄罗斯人在这儿作代表；然而我们是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 当我在一九六八年代表苏联来到这儿的时候，我是以乌克兰人身份坐在安理会的议席上；在我后边坐着的是一位犹太人，我的副代表之一，和我的另一位副代表，一位亚美尼亚人。 这是我国各民族间一律平等，没有敌意和仇恨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们从心底里诚恳地希望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也可以同样的象兄弟一般生活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目标，苏联对塞浦路斯问题政策的目标。 然而中国代表竟对我们作出这些荒诞无稽的指控来。 其实，人们还在笑您说这种话呢；可是我稍后会再谈一谈这一点。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中国对塞浦路斯，对中东，对加强国际安全的问题，对侵略定义以及对裁军所采立场之弱，迫使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不得不以诽谤苏联来掩饰它的脆弱立场和分散人们对这个立场的注意力。

我们深感快慰的是，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得到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积极支持。 我们在第二十九届大会的最近倡议得到前所未有的成功。 我们有关禁止为了军事及其它敌对目的采取影响到环境和气候之行动的建议，得到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 我们的决议，经其它代表团修正后，得到一百二十六票赞成票。 这是对中国向苏联作出的诽谤和中国的反苏主义的一个最好不过的答复。

现在让我们谈谈苏联就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提议吧。 是的，我们提议由联合国或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个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扩大代表会议。 是的，我们提议安全理事会的十五个理事国加上联合国里头不结盟国家集团中的几个国家应该参加这个会议。 是谁阻止了这个提议通过？ 是中国和中国代表。 是谁第一个说话反对这个提议？ 是中国代表。 他帮了谁？ 他帮了那些想将塞浦路斯问题留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去解决而不要联合国参与的人。 因此，塞浦路斯悲剧的

持续，中国连同所有那些制造了这个悲剧而且还在把它继续保持下去的人都得负责任。为了掩饰这个脆弱的难以辩护的立场，中国需要诉诸反苏主义。

是的，紧跟着纷争发生之后，我们的确提议安全理事会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塞浦路斯去。我们仍然坚信，假如在那时安理会就接纳了我们的两项提议，那么，对加速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解决就会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是谁阻挡了这个可能性？是中国，连同那些因为战略上的种种顾虑而不喜欢这提议的人。

这些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中国代表要歪曲事实呢？为什么他要作出这种荒诞的捏造，说苏联建议召开一个会议的唯一目的是为它自己在塞浦路斯取得一个军事基地？正如英国人和美国人说的，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件最不象会发生的事。没有人可以梦想出比这更加荒诞的东西了。说到这里，我想指出，在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机构的工作四年之后，在中国参与联合国整体的工作四年之后，很多代表告诉我们说中国对苏联在联合国各种提议的反应就象莽牛见不得红旗一样。这是真的，这是事实；人人都知道这事，而且人人都在笑。然而关于现在这件事情，所涉还不止此；原因来得更深远。中国为东地中海局势更加紧张而高兴；中国为中东局势更加紧张而快慰。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我已经说过的那些理由。中国要美国同苏联冲突，要苏联和西欧争吵。这是中国和中国领导阶层的一成不变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两个大国，两个中国给予“超级大国”的称号的大国，就将在一场热核战争中互相冲突，并且毁灭——而且这样的战争也不会有别的结局——这样苏联同西欧就将互相冲突并且互相毁灭，而且中国就可以出现成为一个唯我独尊的超级大国。这就是中国领导阶层秘密的梦想。这就是为什么象我已指出的，中国不会动一根指头来帮助加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来促进塞浦路斯问题公正和迅速的解决，来促进中东问题的迅速解决。相反的，中国因局势的恶化而欣慰。这符合它长远的战略目的，基本上就是霸权主义，要成为一个霸权大国。为了这样做，中国在设法利用种种机会，并且也企图利用第三世界。可是所有这些只是痴心妄想是不会得逞的。

暂且让我们假定，照中国代表的发言说，苏联建议在联合国范围内就塞浦路斯问题召开一个扩大会议，是为了要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基地。这是中国理论！可是比我先发言的罗马尼亚代表刚才已提出，我们或许应该召开一个——如果我没有听错口译的话——有地中海东部的国家参加的塞浦路斯扩大会议。可是这是不是说您中国代表要控告罗马尼亚想通过这样一个会议在塞浦路斯取得一个基地呢？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想法，真是荒诞不经。请您想一想到底在说什么话。在座的人究竟是有知识和有经验的，他们不是幼童。您告诉我们的只是给小孩子或大笨蛋听的神话故事。可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笨蛋已找不到了，或者至少数目已小得多了。

最后，我想再指出一点。所有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都知道有人正在走廊里草拟一个有关塞浦路斯的决议草案。显然的，这决议草案的无论那一种说法都会包括一个主意，那就是，如果要恢复谈判的话安全理事会将需要以某种形式参与塞浦路斯两族间的会谈。不过，事实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些理事国——如美国、英国、法国以及一些其它的理事国所寄予厚望的旷日持久的会谈，并没有导致任何结果。与此相反，土族塞人社区的片面行动已搅乱了问题，并且造成了一个僵局。怎么样办呢？有人告诉我们说，应该让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参加下一次的会谈。这是一个新主意，可是它是不象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会各执己见。从前一个房间只有他们两个人；现在一个房间有四个人了；然而局势却不会因而改变的。

因此，单让我们面对事实好了。安理会很多的理事国曾很自然很恰当地想到，或许我们真的应该使会谈能有新的精神，派一个安全理事会两个或三个理事国的小组去参加。对中国代表？我要指出这不包括苏联代表在内，我们不要求参加小组的权利。可是有其它的理事国，譬如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参加。这会真正帮助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以及冲突双方找寻一个解决办法的办法。所以如果这个主意得到实现的话，我们会看到中国代表对此会采取什么立场，他是不是也会怀疑苏联在这方面使用各种阴谋诡计来把塞浦路斯变为一个苏联的基地。

我想我就讲到这儿——并且不必向您表示感激。

主席： 我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行使他的答辩权。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首先，我要提到土耳其代表今天发言的开头。

我对奥尔查伊大使在安全理事会列举的希族塞人的违约行为数目之多，感到惊讶。其中没有一件是在秘书长的报告中提到过的；那里只提到土耳其人的违约行为。或许那些细节有助于说明奥尔查伊大使向我们详细说明过的其他事件。它们之中的大多数和遭受侵略前后在塞浦路斯所进行的谈判有关。当时的谈判者之一塞浦路斯代表克莱里季斯先生现在在座，他比我更能就那方面的问题答复奥尔查伊先生；我确信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这样做。当然，他必须很小心地研究有关这一切事件的发言。

土耳其代表特别提到我国总理在去年八月的声明。他说，卡拉曼利斯先生在到达希腊以后曾经呼吁塞浦路斯与希腊的联合。让我们放实际点吧！我们都记得，我国总理在经过长期的流亡之后回到本国的时候，曾经告诉希腊人民说他不欲对土耳其作战。难道他曾想不经作战达成塞浦路斯与希腊的联合吗？奥尔查伊大使提到的关于卡拉曼利斯先生的这件事同我国有关；他提到的其他事件都和塞浦路斯有关，克莱里季斯先生会就这些事答复他的。但我不想责怪奥尔查伊大使对卡拉曼利斯先生的声明的这种说法。我了解他这个人，我知道他不会故意说出这种谎话。我想他是被蒙骗了。我这儿有份我国总理去年八月所作声明的全文。他对当时面对遭受侵略之危险的塞浦路斯人民说话，要他们团结起来。“联合”和“团结”在英文中也许意义相似。希腊文同样的二个字也是如此。最大的可能是，我的土耳其同事的一些不懂希腊文的顾问们使他看错了。但我有卡拉曼利斯先生声明的正确文本，可供奥尔查伊大使查考。

再者，奥尔查伊大使在他演讲的开头说，他不了解为什么塞浦路斯政府要求本理事会召开这次会议。据他说，没有什么事——绝对没有什么事——可以作为召开本理事会议的重大或正当的理由。但，我们且不要言过其实。一个

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国家毕竟已经宣告成立了。 奥尔查伊大使企图要我们相信这是内政问题。 但他们发送普通照会给尼科西亚的所有使馆，发布了这项宣告，并宣布一个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国家从那时候起成立了，外国应注意到这件事。 这是不是内政问题呢？ 他们宣布要开设领事馆。 谁知道有什么国内行政机构在外国设立领事馆的吗？

但是让我们把这个是内政还是对外事务的问题搁下不提。 在这个议席上谁能否认，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以单方面行动就我们正在谈判的问题之一作出了决定呢？ 他们能否认这件事实吗？

但是我们暂时不谈这一个究竟是内政还是外交的问题。 这个议席上有没有人否认土耳其和土族塞人用片面行为决定了一个双方正在谈判的问题？ 他们否认这一点吗？

奥尔查伊大使谈到另一个不容谈判的问题。 我以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但我现在只要问：这样还能说是正当的谈判吗？ 这是塞浦路斯政府到这儿来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原因。 我建议安全理事会：理事会无论决定通过什么样的决议，决不能忽视这种事实。 我们在这里聚会是由于当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土族塞人对原以为他们会诚诚实实地谈判的各项问题之一，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

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不只是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有一项原则。 这项原则对一切小国而言极其宝贵。 我国是一个小国。 我们不只关心塞浦路斯问题；我们还关心原则问题。 联合国——我承认——也许不能保全塞浦路斯。 不过，我们认为联国有责任为对于世界上一切小国而言是非常根本的一项原则而尽力：这项原则是不容侵略小国；小国遇有谈判的必要时，能够指望正当的谈判。

我们不曾要求与会各国派兵营救塞浦路斯。 我们知道你们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呢？ 我们不愿你们的士兵战死在塞浦路斯。 我们实在遗憾，参加联赛部队的国家的某些士兵已经身死该地。 但是有一项我们非奉行不

可的原则，我们为这项原则效忠，只是在为联合国尽力——不只是为今天的联合国，也是为了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会实现的理想的联合国。

奥尔查伊大使告诉我们，在未来的两个区域或多区域谈判中，首先是达成两个区域或多区域解决办法的问题，其次是保证的问题，都是不容谈判的。

我花了这许多天和你们大家一起试图找出正当的解决办法——或许奥尔查伊大使也在这么做——而且我知道你们之中的许多人也都希望在谈判中提出的两项计划——克莱里季斯计划和登克塔什计划——终究会形成两点，如果用它们作为谈判的基础，或许能够协助我们达成一项解决的办法。先生们，你们有了答案了：不，没有这种希望。这是就塞浦路斯而言的。

现在，我要谈到土耳其声明中有关与希腊的关系的部分。土耳其代表说我在起初的发言中说过，我国政府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到我国的友邦所采取的立场。土耳其代表把这个叫做我对你们施加压力。然后，他又说，除非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双方都接受的决议——那就是说土耳其也接受的决议——否则他就要离开这个会议室，随我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他不参加；他要退席。我对这种行为有一种叫法，但是我要让你们找出来。

现在，我要讲最后的几句话。他谈到希腊对土耳其人的仇恨。我不想长篇大论。我一向不曾对你们长篇大论，我这次也不想说得很长，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事实。

希腊色雷斯省曾有100,000多土耳其人。现在又多了一些。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大概很快乐，而生育了子女。一九六〇年，伊斯坦堡有100,000希腊人——我希望我的土耳其同事不会认为我说到“伊斯坦堡”这个字有什么困难——但是现在只有10,000人，不会更多，或许更少。爱琴海有个靠近海峡的岛交给了土耳其，因为它靠近海峡；这个岛的名字叫因布罗斯，岛上住的全是希腊人。现在不再有希腊人了。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在我国常驻代表团。奥尔查伊大使见过他，因为他曾应邀到我国常驻代表团。他是个看门人；他不年轻，

已经五十多岁了；对英文一字不识。他除了看门以外，什么也不能做，我是因为同情他才用他。他别的什么都不会。

谈到仇恨，奥尔查伊大使谈到的是书刊上的，我谈到的是实际存在的。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行使答辩权。

克莱里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必须答复奥尔查伊先生，一方面，他指责我说谎，而同时又忽视我，说我不代表任何人。我不打算象他那样，因为我既不怕公开讨论，也没有良心责备。也许我应该忽视象他那样的人，因为他为今天在我国土地上驻有40,000军队占领着我国领土百分之四十的国家说话，还把自己说成是塞浦路斯的自由、不结盟和存在的保护者。

我将漠视这位代表忽视我的存在的事实，因为我的在场将证明真正问题之所在和土耳其代表用以把讨论扯离真正问题的方法。

在他巧妙的演说中——该称赞的我还是称赞——他所采取的策略，首先是想向我们大家说明：我们没有理由到这儿来——事实上，我在浪费你们的时间，而你们是在浪费时间——处理和审查塞浦路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是希族策划的、希族捏造的，为的是使各位代表到这个庄严的机构来而加以玩弄。

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塞浦路斯一切都很好，因为我们面前有一罐蜜糖，因为我们应当让土耳其部队来解决塞浦路斯岛上的一切问题。

但是，让我来答复他——不是用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是一个不可靠的希腊人——让我用秘书长的话来答复他。我们是不是在塞浦路斯面临着严重的局势？我们在那儿面临严重局势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不遵守或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呢？秘书长已经在安理会的讲话中明确地答复了这些问题：

“首先我要强调，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所赞同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中所规定的准则来解决塞

浦路斯的局势不能取得任何进展，该岛的局势就构成对东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第一八一四次会议，第3—5页）

我在安全理事会的第一次发言中说了些什么呢？我说塞浦路斯的局势很严重，我说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没有得到执行，我说由于那些决议没有得到执行，因此既不曾取得进展，也不可能取得进展，僵持的结果对于和平、对于我们大家都是危险的。我随后又说，除非安全理事会采取有关的措施、必要的措施以挽回局势，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就无法继续存在。

在秘书长确切无疑地确认由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未获遵守因而塞浦路斯的局势非常严重以后，土耳其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在玩弄诡计、希腊人的诡计，使人注意他们所要隐藏的事实：就是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一点也没有执行。

然后，他还说我说谎。我已经五十五岁了，由于参与政治，许多人骂过我。但是到今天为止，我国没有一个希族塞人或土族塞人曾经说克莱里季斯是个说谎者——我对这个事实非常自豪。他为什么说我说谎呢？因为我说在塞浦路斯的谈判根本毫无进展而歪曲了事实。

土耳其代表承认，谈判并没有进展。关于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我们对什么事情不同意呢？就是关于第3212(XXIX)号决议的执行上是否有任何进展？关于这一点，他也没有宣称他为了决议的执行采取了行动。正相反，他避不答复我适当地向他提出的关于决议的任何问题。

我曾经问土耳其代表，土耳其有没有依照第3212(XXIX)号决议撤出任何土耳其军队呢？至今未有答复。我问了他一个很适当的人道主义的问题。有没有任何难民依照第3212(XXIX)号决议回了家呢？他有没有采取过紧急的措施使这些难民回家呢？我得不到任何答复，因为他不能说，有过任何进展。

然后，他厚着脸皮说，因为我过早地提出了保证的问题而耽搁了会谈。甚至关于这件事，我也不愿意说，知名而卓越的土耳其代表说了谎。我要说他所获得

的情报是严重地错误了。

为了使记录正确，让我向理事会宣读那次会议的记录——我不只要宣读，还准备把它们提交理事会。那些记录的每一页都有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的签名，现在我要预先强调，谁也不能说这些是我捏造的。

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不愿再被称为说谎者。让我们来看看这份文件，看看到底问题是什么，会谈是那一天举行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阁下给了我一封信：

“随函附上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六你同登克塔什先生之间的对话记录。请收下，等等。”

同样的一封信也给了登克塔什先生。我们两人都收到同样的经过签署的记录。起先，登克塔什先生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同样的保证条约，以及是否愿意把我们同意的每一件事都提交保证国核准。

我的答复如下：

“克莱里季斯：审查保证问题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所以，我既然说整个事情还未成熟，我怎么会提出保证的问题？我随后又说：

“我承认将来必须有外面的保证，但这不能由我们决定。这个问题必须在不同的一级上审查。”

我不能未经任何政府的同意就答应它会做保证国。当时我正在主持两族间关于塞浦路斯宪法问题的会谈。所以为什么——我强调，为什么——在那个阶段要求我就愿意或者不愿意接受那一种保证表明态度，并且问我是否愿意把我们之间所同意的任何事情都交由保证国裁决。然后，登克塔什先生说：

“在那一级呢？

“克莱里季斯先生：我不能讲明是那一级。但是，我说，我们这一方不会反对，在这一级上，希腊和土耳其如果愿意的话，以及其他国家，可以参加保证。”

我是在妨碍还是设法告诉登克塔什先生：我们是来讨论塞浦路斯宪法的，要说到依赖保证，要谈论保证，我认为时机还未成熟。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害怕的是土耳其和希腊会被排除，那么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一级上讨论这个问题。

此外，土耳其代表在许多问题上所获得的情报也有很大的错误。他说，我们召集全国委员会——我已经解释过，所有政治领袖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路线。我们当然这么做了。注意到会谈没有进展，我们决定了要怎么做才能使会谈有所进展，而我们就这么做了。

我们决定向登克塔什先生提出书面建议，并且我们在会后公开声明，我们决定采取的措施就是向土族一方提出书面建议。

在假装没有发生严重的事情、没有理由召开安理会以后，他又继续说了发言的第二部分——他的战术攻击——企图用指控希族塞人的领袖从一九六〇年起的各种罪行的办法来破坏希族塞人的人格尊严。在我开始的发言中，我说过，我不愿追溯过去，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中已经屡次讨论过过去的事情，由于知道会有这种战术，我不愿意被卷入这种持久战，我不愿意脱离主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是第3212(XXIX)号决议有没有得到遵守，是否需要新的程序。

但是，我确曾向土耳其代表保证过，我既不缺少可靠的事实，也不缺乏充分的理由。回说到这里，我可以不管切不切题，宣读从一九六〇年以前到今天由土耳其领袖——在塞浦路斯的和在土耳其的——所作的一篇又一篇的演说，说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政策是瓜分这个岛，而不是使它独立，这会使安全理事会厌烦。在安全理事会的下一次会议上——不是今晚，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些文件——我将让土耳其代表尝尝他试图挑起的这套战术的滋味。

土耳其代表作了一个可以真正解释整个局势的、非常明确的声明。在他分析过我对登克塔什先生提出的建议以后，（我不打算在这儿或任何别的地方讨论这些建议，因为根据有关的决议，宪制问题是两族之间的问题）最后他说——我们大家都听到了——土耳其不接受多区域的解决办法，而坚持双区域的解决办法。这个声

明应当使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疑问了。

这正是我曾抱怨过的事：安全理事会为谈判宪制问题提供了议场。这个议场本来是什么呢？这个议场就是我与登克塔什先生的会谈。这个会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决定到底解决办法是多区域的或双区域的。土耳其代表对我们说了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只会接受一种解决办法，因此你们只能讨论一种解决办法。”而这种解决办法就是双区域的解决办法。

要了解土耳其代表为什么不愿意执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有什么困难么？这是因为如果土耳其部队按照那项决议撤出塞浦路斯，他就不能以枪口指着人说：“对塞浦路斯问题只有一种解决办法，而我以礼貌敦请你们讨论这种办法。如果你们这么做了，那么就可以如第3212(XXIX)号决议所设想的，自由地在平等的立足点上进行谈判。”

我们这一方犯过一些错误，土族那一方也犯过一些错误。这就是我们到这儿来的原因。但是至少我这个“说谎者”，从一开始就真诚坦白地承认，我们这一方犯过错误。或许我相信忏悔对灵魂有益。然而，土耳其代表在这儿告诉我说，所有的错误都是我们犯的，土耳其没犯过错，所有的错误都是希腊犯的，希腊犯过许多错，但是土耳其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包括没有犯过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的错。

时间过得很快，我并不打算在这个特殊问题上使安理会厌烦。但是，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我保留我的立场，如果土耳其代表不想同我讨论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有没有得到执行的问题，我也愿意照此进行。不过，我将讨论土耳其的政策错在那里，希腊的政策又错在那里问题。但是，如果安理会相信——我确信安理会相信——这不是审查这个问题的适当议场，那末，我再一次公开说土族一方不愿意听到的话：我郑重地正式邀请关于这些问题的调查团来确定错误在那里，谁犯了这些错误，和为什么塞浦路斯会处在今天的境地。我愿意听到土耳其代表发出同样的邀请，而不是对我说，这又是一个希族欺骗世人的诡计。不，这不是一个希族的诡计。这是为了查明真相，如果我们查明了真相，那么，或许当我们没有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时，就不必躲躲闪闪了。

主席： 土耳其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 我愿简短地答复许多位代表所作的声明，同时，对于我个人所尊敬的克莱里季斯先生的正式身份我将象往常一样持保留态度。鉴于我个人及我国对法律体制的尊崇，我无法承认他是塞浦路斯的代表。 我只可以称他作正巧坐在本理事会塞浦路斯名牌后面的可敬的希族塞人。

克莱里季斯先生刚才所说的话多半与我认为我已经答复或土族塞人代表即将要答复的问题有关。 我确信土族塞人代表会在时机成熟时澄清事实。 我必须很诚实地对待这个问题。 我之所以不能回答，原因之一是我并非谈判的一方。 我不知知谁在什么时候说了些什么。 我要依赖记录。 我确信如果安全理事会觉得有必要，那么比我更接近资料来源的切里克先生必定更能向安理会说明克莱里季斯先生所提出的某些问题的详情。

我想澄清一件事。 我当然不是说克莱里季斯先生说了谎。 我不认为坐在这张会议桌前的任何尊贵的人士会说谎。 我所说的就是“谎言”这两个字，我希望逐字记录能把这一点写清楚。 我用“谎言”这两个字来形容有人说我国外交部长所采取的行动，就是给塞浦路斯谈判造成某些后果的行动。 我否认这件事的经过是别人所说的那样。 因此，我希望克莱里季斯先生对于我对他个人的感情和尊敬的解释感到满意。

他在谈话当中硬说我说了许多话，我不记得我今天曾说过这些话。 我匆匆作了一点记录，但是我记不清楚他到底用了那些我没说过的字眼。 不过，愿意看一看今天会议的逐字记录的人应当很容易找出这些字眼。 至于谁在什么时候就塞浦路斯问题说过什么话——希腊方面也好，土耳其方面也好，希族塞人方面也好，土族塞人方面也好——我必须声明，不论克莱里季斯先生的辩论所根据的文献有多少——我想很有礼貌地就这一点提出挑战——什么也比不上所谓的独立、不结盟塞浦路斯国首脑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所发表的用希塞统一来结束该国独立的最终目标的言论记录。 我相信就这一点来说，我的根据是很结实的。 但是我还是想让切里克先生

来说。如果他能获得本理事会的特许再度发言，他一定能举出数不胜数的此类事例。

有人提到对塞浦路斯谈判的外力干涉。克莱里季斯先生说谈判只在两方间进行，任何人或国家——包括我或土耳其在内，都不能说什么话——大意是这样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话。可是现在我愿引证希腊大使发言最后一段里的话——这几句话正好也是克莱里季斯先生发言另一方面的答复。希腊大使说：

“无论如何，我必须通知安理会，鉴于我们面对的敲诈手段，甚至希族塞人接受了的解决办法，我国也不准备接受，除非我们深信”——即希腊政府深信——“他们是出于自由意志而自愿接受的。”（第一八一三次会议，第47页）

我想希腊大使并不真正了解我所说的敲诈手段——他说他很讨厌这种手段，我确信他真的讨厌——我并不是指土耳其或希腊关系而言的他在发言时说——而我发言时也就是引证他所说的话：

“我们同理事会的每一个理事国都有友好的关系，我们需要并决心根据他们的立场来检查及调整我们的立场。”——这是针对他们在安理会所预备采取的立场而言的。（同上）我认为这就是加诸安理会理事国身上的一种压力，我还说如果是我说了这些话，那将是一个很可憾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各国与冲突各方都有双边关系，但是通常都没有这么明显地讲出来过。这就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

现在我记不清楚是希腊大使还是克莱里季斯先生提到过土耳其部队入侵塞浦路斯。在安理会我已花了很多时间来应付这整个入侵问题，我的前任也应付过这个问题。塞浦路斯的历史很奇怪，一直与“入侵”这两个字有关。可是只有在正巧是土耳其部队是入侵者的时候才用这个字眼。我已多次说过，希腊本土人和希腊军队长久以来一直在入侵塞浦路斯，我相信过去多年来安全理事会的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是从来就没有人把这叫做入侵；事实上，那个由于当时的入侵者判断错误而被罢黜的不结盟的独立国家的总统在这儿曾公开地说，事实上是他请希腊军进驻该国的，可是这些军队行为不端——这些话是有案可查的。

这招来了相反的结果。他们听从某些其他命令，而不听从他以为他们会听从的命令。

因此土耳其部队进驻塞浦路斯事实上正好平衡了长期入侵的情况。土军进入一则为阻止希腊以入侵方式把塞浦路斯变成希腊的一省，二则是为保证希族领导人在最后解决土耳其人问题时不会把土族人民作最后牺牲。关于这一点，我还可以引证许多话，但我现在不预备这样作，因为我也并不是一天到晚带着我的案卷的。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题目。

我同意大家在塞浦路斯都犯了些错误。我们当然不是在塞浦路斯第一个犯错的人。事实上，安理会所承认的最严重的一个错误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就是整个格里瓦斯事件以及希腊部队正式撤出塞浦路斯。但是那时候之所以没有造成任何惊天动地的情况，是因为无非是土族人在希族人手下受尽了痛苦。

这使我想到“仇恨”这个词的问题。我希望至少有一句话是我可以说的，那就是我认为希腊大使卡拉扬尼斯大使是不屑有这种情绪的。我对他以及我许多希腊朋友的尊敬不允许我说所有的希腊人都恨土耳其人。说这样的话是有罪的。可是请注意，一般希腊人对土耳其人的感情是有问题的。或许是因为希腊人遍布世界各地而各地并没有多少土耳其人的关系，而使这一点看起来比较明显。

在辩论塞浦路斯问题的整个夏天里，我从办公室来到此地一直有问题，通常这个问题都是通过东道国代表团的力量、了解和帮助来解决的。那些高唱反土耳其歌、反土耳其口号的人既非居住在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亦非居住在希腊的希腊人。其中有些人是已经在这个国家住了好几代的希腊人。

前些日子我看到《纽约先驱论坛报》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来自塞浦路斯某处已经在美住三、四十年，因此与塞浦路斯无关的希腊人的。早在塞浦路斯获得独立以前他们就在美国了。他们把他们对一般土耳其人和土族塞人的感觉写在信上，大批地寄给美国政府、他们的参、众议员，而这些信并不都是充满着爱心的。

这都是事实。我已提过今天《纽约时报》上所刊载的一页内容。我必须说我很感谢卡拉扬尼斯先生如此自然而又清楚地说了“伊斯坦堡”这几个字，但我必须指出这个国家里希腊分子的宣言——我说过这只是千百人之中的一小部分——却未用“伊斯坦堡”这几个字。宣言提到“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内容中充满了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的罪行和屠杀事件。我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希腊人跑到小亚细亚是干什么去的？

我很感谢沙特阿拉伯大使昨天在他的讲辞里对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几次事件作了更客观的叙述。

为了证明希腊人多么爱土耳其人，希腊代表对我说，现在希腊北部的土耳其人比过去多了。这些土耳其人是少数，而少数民族问题正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问题，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我们两国政府过去和现在也许都犯过错。但是，谈到希腊北部的土耳其少数民族的地位，这确是一个令人非常非常遗憾的情况。他们的人数未减。我想这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与土地分不开的人；他们多半是农民，正与移动性较大的希腊人相反，这些希腊人的财产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

我不想再为这个问题多费唇舌。塞浦路斯的主要问题比这严重得多。

关于有一点，已经提到过在各地设立的所谓的领事馆。据我所知，在许多地方——比方伦敦，又比方德国及其他地方——一直是有领事馆的；显然在美国也需要一个，因为这里是大量土族塞人的集中地，多年来他们一直很难申请到护照、证件和出生证明。获得出生证明对土耳其人来说一直是一个问题，即使在塞浦路斯也如此。这是和他们为难的一种方式。

我曾经说明过一个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如何才能获得护照。只有在确定他不再回到塞浦路斯时，才发给他护照。我想上面所提的领事馆能帮助解决此类问题。但是这些领事馆当然并非国际法中所指的领事馆。我再重复一次，我们从未要求，同时我也不认为土族塞人曾要求大家承认已经成立的联合邦。

今天晚上我就说到这里了。我希望我不用再谈这种问题。可惜的是凡是今天下午行使了答辩权的人都还有很多其他机会在会议桌前说很多话。但是主席先生，我要象过去一样恳求你，希望你在适当的时候让比任何人都更熟悉实际情况的一位土耳其人，即土族塞人代表来回答今天辩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主席： 现在我请希腊代表发言，行使他的答辩权。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 我很感谢奥尔查伊大使对我个人的感情，我可以向他保证，对他，我也有完全一样的感情。

说了这话，现在我愿表明下述意见。我们都面对着堆积如山的争论。我当然也和土耳其代表一样有困难记下所有的争论。因此我不得不保留我的答辩权，以后如有必要，将再对奥尔查伊大使的争论逐条作答。不过，有几点是我现在必须答复的，这当不致于花理事会太多的时间。

关于入侵问题，如果我们说我们也入侵了塞浦路斯，可是没有杀人也没有奸淫少女，奥尔查伊大使对这样的说法是否满意？

奥尔查伊大使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曾问及：希腊人跑到小亚细亚是什么去的？那么我请问：土耳其人呆在希腊五百多年又是干什么去的？

奥尔查伊大使也说少数民族带来了问题。不错，少数民族给各地都带来问题；问题在于土耳其对少数民族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把他们消灭掉。这就是土耳其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所强调的。

至于仇恨问题，我仍坚持土耳其代表所给的有关希腊人仇恨的证据只是口头上的证据，而在这一方面我给的证据则都是事实。

主席：

现在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对马立克先生的长篇所谓答辩简单讲几句话。刚才马立克先生的答辩是对中国代表团立场的歪曲和诽谤。他甚至企图挑拨中国和塞浦路斯人民之间的关系，这完全是徒劳的。中国今天不是，而且永远不做侵略、干涉、控制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中国对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象中

国在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一样，都是始终一贯的，是光明磊落的。 我们不图谋任何私利。 我们从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出发，历来主张塞浦路斯问题应由塞浦路斯人民自己在没有外来干涉，特别是在排除超级大国插手的情况下，通过和平协商来谋求解决。 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真正合理的解决。 象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问题一样，哪里有超级大国的插手和争夺，哪里就出现动乱，哪里的问题就只能更加复杂化，局势就更加紧张，谋求合理解决的努力就更加困难。 这已成为人们从切身经验总结出的一条规律。

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进行激烈争夺，这是个客观事实，并不是什么人的发明创造。 苏联政府近些年来在世界各地进行扩张和侵略的记录，是无法抹煞的。 全世界人民都看得一清二楚。 至于苏联政府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也是有目共睹的。 你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利用矛盾，扩大争端，唯恐两族之间早日达成协议，使你们失去插手和干预的机会。 你们宣扬召开的所谓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就是自己要削尖脑袋钻进去，以便直接插手。 事实十分明白，不管你们如何花言巧语，都无法掩盖你们的真实目的，这就是要使事态更加复杂化、扩大化，以便你们混水摸鱼，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地中海，实现老沙皇控制这一地区和进而称霸世界的迷梦。 你们愈是狡辩，就暴露得愈清楚。 在日益觉醒的世界人民面前，你们这一套手法毕竟是心劳日拙，难以得逞的。

我现在以主席的身分，请苏联代表发言。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中国代表所说的还是那一套无中生有的反苏滥调。 既然我已经作过答复，我认为没有必要再重复一次，从而延长安全理事会的会议。

但是，针对他的新谎言，我想提醒他苏联为了使这个世界为使全人类和中国免受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统治，牺牲了2,000万人的性命。

主席： 现在，名单上没有其他的发言人了。因此，我准备宣布散会。经过与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的结果，大家同意明天即二十八号将不举行会议，以便各成员国进行自由协商。下次会议的时间，将在成员国协商后再宣布。最后，我愿感谢在发言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友谊的各国代表。

午后七时十五分休会